



纸上纪录片系列

江村纪事

张祖道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纸上纪录片系列
已出书目

《江村纪事》	张祖道
《火车上的中国人》	王福春
《希望》	解海龙
《茶铺》	陈锦
《上海人》	陆元敏
《寻常》	路泞

镜子般的原生态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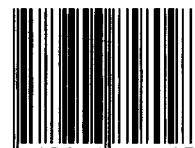
直观展示行进于巨变中的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状态。

深度的视觉记录，

不仅表达了个体的深刻观察与思考，

也必将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

上架建议：文化 艺术
ISBN 978-7-80685-809-7



9 787806 858097 >

定价 32.00元

纸上纪录片系列

江村纪事

张祖道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总策划 王刚 执行策划人 姜纬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江村纪事 / 张祖道著. –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
(纸上记录片)
ISBN 978-7-80685-809-7
I. 江… II. 张…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吴江县－摄影集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9007号

总策划 王刚
执行策划 姜纬
特约编辑 颜文斗
责任编辑 洪健
整体设计 胡斌
技术编辑 李荀

书名 纸上纪录片 江村纪事
著者 张祖道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X1092 1/16 7.5印张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80685-809-7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重涉昨日之河

人只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另外的方式，击穿记忆的坚冰，重返那些曾经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空间。

摄影应该就是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种以每一个人满足自我为第一需要的影像记录方式，真实地记录了此时此地的一切所在，它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开启了人类对自我发展进程进行实证的一个过程。

历史，无疑是一切瞬间的总合。当一些具有特殊品格和旨趣的人，在道德感的规范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用影像表达一种寻常却别有意味的视角，这种镜子般的原生态的记录不仅表达了个体的深刻观察与思考，也必将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和怀想。

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纪实摄影以其渗透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和作品，广阔而深入地展示了这种震撼世界的变化，甚至直接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一批摄影家怀着强烈的时代认同感，用自己的作品对行进于巨变历程中的中国人精神和生活状态进行了深度的视觉记录。他们的作品不仅呈示了难以取代的价值，而且始终给我们以超越时空的感动与沉思。

纸上记录片系列丛书，主要选取近数十年来中国优秀纪实摄影家专题作品，希望以开放、包容的方式，能为研究和观察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真实、完整、直观、系列的视觉文献材料。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场景，在恍惚的意念中，重涉昨日之河。

随费孝通师访问江村

张祖道

江苏吴江县是费孝通先生的家乡，吴江县震泽镇的开弦弓村对于他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我曾随费孝通师多次访问开弦弓（江村），其中有两次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印象最为深刻。一次是1957年5月，一次是1982年1月。1957年这次，是费先生1936年之后的重访，时隔21年之久，在费先生的学术乃至人生经历中都是很关键的一次。

1935年10月，费先生和同窗好友、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去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他们从南宁到柳州，顺柳江到象县（今象州县），从这里进入大瑶山。12月16日，夫妻二人在从象县古陈村翻山越岭前往平南县罗运乡做茶山瑶调查时，遭遇迷路，黑暗中费先生误触猎人布下的虎阱，被大石砸伤腰腿，王同惠急忙去找人相救，不幸掉入溪水中丧生。

费孝通在广州疗伤后，回到北平。1936年初夏返乡疗养。姐姐费达生建议他到开弦弓村去休养和了解一下农民生活。他去了，在那里和家乡农民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同年10月，费先生到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师从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斯基教授（B. Malinowski），依据在开弦弓的调查材料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1946年，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到二年级以后，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研读工业、农村、城市等社会经济状况，课余常去老师家中聊天和讨教。1949年以后，我们都参加了工作，我和同班好友黄沙（在校时原名黄宗英，因为与名演员同名，更有性别之尴尬，故而改名）在一起工作，经常同去中央民族学院老师家去请安和组稿。有一次谈起全国农村合作化的热闹迅猛情况，费先生说：“我从1950年6月开始访问贵州少数民族，次年10月访问广西少数民族起，就一直专心于民族事务，在民院的学

术、行政以及写作方面，都离不开民族，而把农村农民的研究丢荒了。江村的兄弟父老，一别就是20年啦！”确实，自1936年访问开弦弓后，这个奠定他学术地位的小村，费先生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访，心中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潘光旦先生和我们都鼓励费先生再去家乡吴江跑一趟，看看开弦弓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新貌，再做一次田野调查，再写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包给我们《新观察》发。费先生说：“那好，文章当然给你们，但你们得派个记者去拍照片配合。”于是费先生去申请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我们回单位汇报。潘先生也兴起说他不久要去湘鄂川边区考察、识别土家族，“《新观察》是不是也帮着拍点照片？文章也给你们。”这当然是一拍即合。

费先生工作忙，腾不出手，倒让潘光旦先生先领着我，在1956年冬天，到川鄂湘边区进行土家族调查。直到1957年4月，费先生才可成行。费先生和《新观察》杂志文艺组的张凤珠等一行于1957年4月26日动身去江南“重访江村”，我因为要参加当年“五一”劳动节的采访只能随后赶去，一直忙到5月8日张凤珠第二次电报相催，方匆忙乘夜间11时的快车离开北京。我对吴江之行充满热望，一是高兴有机会和老师一起工作；二是为能到恩师家乡观看合作化后的农村新貌而兴奋。

10日晨到达苏州。找到长途汽车站，搭乘去吴江县震泽镇的汽车。这是辆木炭车，不是运输木炭，而是燃烧木炭产生汽体取代汽油推动汽车行驶。这种在抗战期间流行的汽车只有农村公路上还能见到。汽车一直向南行驶，到达平望后，换乘16座的小公共汽车偏西继续前行。江南平原不见山丘土坡，只是桥多河多，经过梅堰后，于9时45分到达震泽镇。从镇上到村子没有公路，要在桥下小码头乘船才能前往。桥上桥堍就是一个热闹的小市集，卖菜，卖鸡鸭鱼蛋，还有好几个小孩，每人抱着一只大白兔，不知它们是怎么被养大的。

很快就雇到了一只售完货回村的小船，一叶扁舟静静的在小河里滑行。暮春的田野，一片开阔，空气清香，景色宜人。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幼年生长的故乡呀。他从吴江而苏州，而上海，而北平，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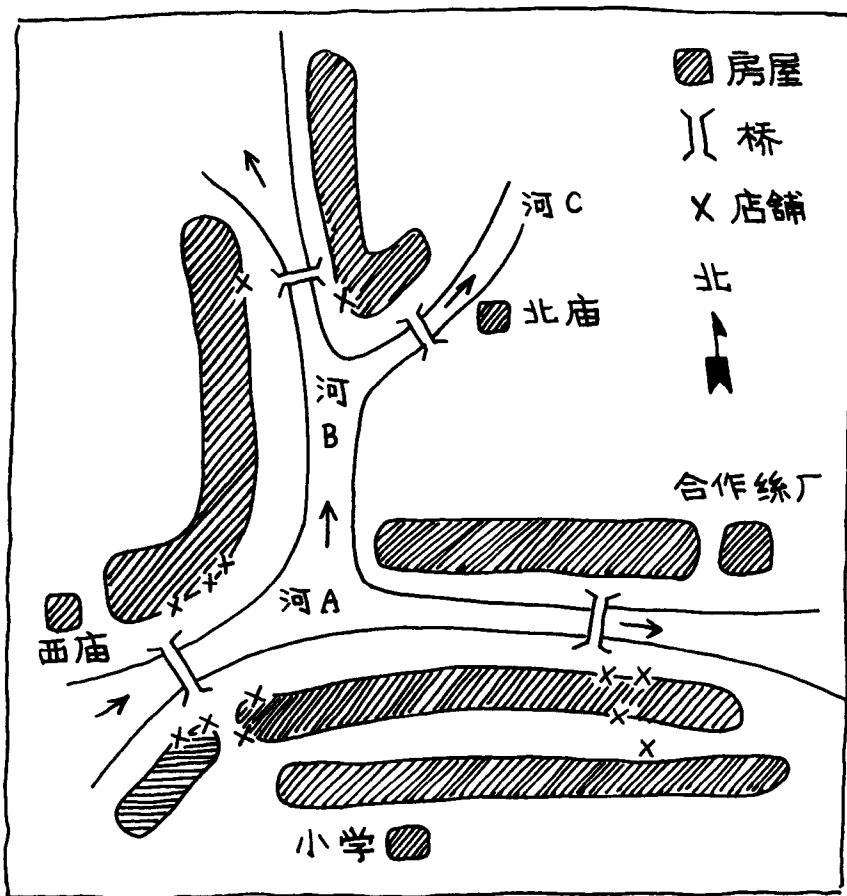
燕京、清华大学，193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获得硕士学位，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公费留英名额。

直到正晌午过后，小船才把我送到开弦弓村。这就是开弦弓，这就是“江村”。这是费先生1936年夏天第一次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子，距今21年了。

我伫立在路端眺望整个村子，一条小河分成两支穿村而过，两岸拥挤着房屋。河里泊着小木船，船旁游着鸭子，岸上有水田、桑园、菜地。有人说，村的地形特别，像一张拉满弦的弯弓，蓄势待发，所以起名“开弦弓”。除了村名以外，它和太湖沿岸，以及江南水乡其它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村庄一样，劳动生产、养家糊口，没什么异样。正因为如此，费先生对它进行调查、加以介绍，它就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的典型代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费先生告诉我：“我和姐姐，以及一起从北京来的青年朋友在村里做调查，进行家访和分批召集老年男女社员座谈，了解1936年前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后的生活、生产，收入和消费情况。算农业账，也算副业账，20多年的账，20多年的日出日落，算起来复杂呀，麻烦呀。我和青年朋友和平共处在他们住的楼上（全村唯一的一幢两层楼房），每天晚上打算盘，摇手摇式计算机，把手都摇酸了。天天干到深夜，你想想，每人要上下扒拉算盘珠子千百次，摇转手柄千百次，那是很难数清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计量灯油，这半个月，平均每天烧掉煤油一斤，你就可以掂量出我们每天熬夜到几更天了。”

费先生又问我：“除了大二上的‘机关参观’课，每星期一次全班同学跟着老师去参观访问一所聋哑学校、一家精神病院、一所监狱等，每次写一篇初级的报告以外，你还做过较正式的调查吗？”我回答道：“从昆明北上时曾和几位高班同学跟陈达、袁方等先生做过一次约3个月的上海工厂调查。先是工厂概况调查，约有三四百家。完成后，我和另外几位又留下做个案调查，要设法访问各个工厂的工友，这才知道调查的不易，才知道获得一份够质量、讲真话的记录的困难。”



村庄详图

农桑时代的开弦弓地理。费先生在《江村经济》开篇中这样描述：“开弦弓的‘脊梁骨’系由三条河组成，且暂定名A、B和C。河A是主流，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开弦弓由此得名。”

费先生说：“做个社会学工作者是不容易的。我在开弦弓有个优越条件，我姐姐费达生在这里多年做桑蚕改良工作，人际关系好，连小孩子都叫得出她的名字，所以我去访问，家乡人都欢迎，有问必答。我们现在调查到副业，种类多，问题复杂，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总的情况就几句话——成立了新中国，农民信心大增，原来是个体户，然后成春助夏散的互助组，去年又由初级社扩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谓形势大好，问题不少。你先拍两天，等有感觉再谈。”

我从11日起，拍了两天照片。11日是农历四月十二，正是黄梅天即将来临时，阴雨绵绵，适于拔秧插秧，容易生根成活。同时由于湿度大，蚕宝宝容易得病，而不利于养蚕。开弦弓村合作化后，由永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夏成立联合第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化后，有一些优良生产方式依然保存下来，如养蚕室，农民是将改良蚕种集中科学消毒、孵化、喂养，等到蚕宝宝三龄（三眠）以后，发育长大、食量大增、体质强壮，就分装蚕匾（蚕箔）用船摇送到各组喂养。今年他们已有一批上簇结茧，将茧子送往收购站。现在的这批已达三龄，不再害怕湿冷了。水稻田里正忙着插秧，村里，有经验的社员还在河里浸泡稻种，这是晚稻种子，大田里的秧苗是春花（早稻），社里种的是双季稻，产量高。

第二天晚上，我去见费先生。我说：“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去年粮食增产，社员分到的粮食多了。但是也听到小孩说米饭不够吃。拍照时看见有不上学的儿童，背的不是书包，是箩筐，到处割草，用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不像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看到的千百头牛羊在大草原上游着牧着。这里是走进屋里才见羊，掀开缸盖发现兔，小打小闹。水村的船和城里的自行车一样多，一出门就上船，我还被送上村外几个小岛一样的小水田小土堆上拍照。感觉就像我家乡山顶上的小梯田，放不下水牛的四条腿。河畔宅旁泊着的空船很多，只是用来上下工的话，利用率低了些。”

费先生回答说：“你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农业合作化是古往今来一大新事物，新事物就会出现新问题。开弦弓位居苏州、杭州之间和太湖之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鱼米之乡。农民的生活



1947年12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与老师费孝通和师母在其住所清华园胜因院39号门前合影。前排左起：张祖道、费孝通和夫人孟吟。

水平和收入，要比其它地方的高。但是这儿人多地少，苏州专区9个县，每人平均只有1亩8分地，仅靠农业生产养家活口是不够的。”

我问除了粮食生产，还能生产什么呢？费先生说：“生丝。千百年来，苏杭一带是丝绸的主要产地。过去，这一带的‘辑里丝’畅销国外，但是到二三十年代，我们土法生产的生丝敌不过后来居上的日本丝，销量和价格大跌。我姐姐一辈子从事蚕桑事业。1920年她从苏州的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去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学习制丝，1923年毕业。第二年，达生姐带着改良蚕种和养蚕新技术来到开弦弓，帮助发展养蚕事业，又于20年代末协助开弦弓组织生丝机制合作社，创建采用新法用机器缫丝制丝的开弦弓合作丝厂。1929年夏初春蚕结茧时开机缫丝，产品畅销上海和国外，发展了这一主要副业，并且培养了不少本村女技工，使村民提高了收入。姐姐和村民关系融洽，因此我1936年的调查非常顺利，写出了《江村经济》。”我说：“那时在清华上课时听你讲过，只是简单介绍，你的原著却一直没能读到。”费先生说：“在伦敦出版时，是英文写的，原书名用的是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我急于回国，于1938年回到昆明，一直工作忙，生活不安定，还没有把它译回中文来。”

我们又扯回到副业的今昔，费孝通说，1936年开弦弓的船只也很多，除做家用交通工具外，又用它罱河泥，做水稻的基肥。到秋天，摇着橹去做买卖和替人运输货物，就是重要的第二副业，可以赚不少钱。其它如养羊、养兔，动物的粪尿是很好的追肥，可以卖，出卖羊、兔也是一笔收入。那时种的是单季稻，不种春花，平均每亩产350斤，除去税收、盘剥，如果没有副业补助，生活就会艰难。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加上生活节俭，日子过得还可以。

进入高级社的开弦弓，1956年种的水稻，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社员们很高兴，于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8月一场台风，把产量降为559斤的中等丰收，使得少数家庭感到口粮紧张。



1957年5月，费先生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坐在当年的教室里。

副业方面，社员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可是桑叶减少了很多。沦陷时期为了防止游击队袭击，日本侵略军大砍桑树，加之现在桑树老化、桑田削减、买不到外地桑叶等等，限制了养蚕事业的开展。村里原有的合作丝厂也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拆毁。目前，舟船水运方面，县镇建立了航运公司，个人就不能私运了，羊、兔受饲料产量限制，无法更大发展。

经过调查研究和与社员的多次座谈，大家把眼光投向广阔的水面，那里可以发展众多的副业，准备先从水浮莲下手。水浮莲可以做饲料，喂养猪、羊、兔，又可以当肥料肥田。

我在细雨绵绵的苏南水乡，紧张地工作了5天，拍摄江村初步农业合作化了的社员生活和劳动。

1957年5月16日清早，我随费达生、费孝通姐弟乘一叶小舟，在低吟的咿呀声中回到吴江县城松陵镇。费先生带我到富家桥弄窄窄的小巷，那里是他1910年11月2日降生的地方。前行不远，我们共同走过他上小学时天天要通过的小石桥，再前行不远，就是他经常怀念的雷震殿小学（大名吴江初等小学），还去了几处留恋的故地。傍晚到达苏州的招待所。

费先生整理完开弦弓调查资料后，于18日清晨动笔《重访江村》，他真是潘光旦先生欣赏的一名快手，不到两天已写就并快邮寄出。在校时，同学三五，常上费先生家请教、聊天，宁神静气地听他侃侃而谈，只惊奇于他的思维缜密，言谈反应敏捷，没有想到他还是位洋洋洒洒的作家。

5月25日，费先生又开始写《“早春”前后》。傍晚散步时，他谈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和分析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看法。

回到北京后，我挤出几个晚上，将费先生在苏州、吴江、庙港接待干部农民来访、投诉、提供的情况加以整理、分类、誊清，挂号寄给费先生，共有上百件，他要将这些民情向上反映。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回到吴江县松陵镇出生的旧居。这次访问家乡，费先生感慨、兴奋，也对当时的农村工副业后退的状况忧心忡忡。回到北京后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发表于1957年6月第11、12期《新观察》杂志。不久，费生成了右派。直到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先生赫胥黎奖章（这是人类学的最高荣誉），为准备到英国的演讲，费先生于1981年10月又短暂地访问过江村，并在英国发表了“三访江村”的演讲。